

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形成、組織 及其經濟「權益」

高綱博文* 著 末武美佐** 譯

2014 年 1 月 12 ~ 18 日，本院陳國川院長和本系吳文星、陳登武教授，帶領研究生和學士班學生 31 名，前往東京日本大學進行「移地教學」活動，受到該大學熱烈歡迎和接待，課程安排緊湊而慎重，學生收穫十分豐碩。其中，1 月 14 日（二）邀請日本大學資深教授高綱博文老師講授：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形成、組織及其經濟「權益」（日本大學陸亦群教授擔任口譯）。

高綱教授目前係日本上海史研究會會長，專研中國近代史，致力於近代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研究長達 30 年，發表專題論文 20 餘篇，出版專書 10 種，著述豐碩，見解精闢，深受學界重視和肯定。當天高綱教授根據其長年研究之成果，撰寫專題講義，精要地分析解說近代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形成、組織及其經濟「權益」之關係。同學們深受啟發，獲益良多，殷望能有機會進一步拜讀高綱教授大作。幸蒙高綱教授惠允提供原稿，爰商請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末武美佐譯成中文。本系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經討論後，特決議以「論著選譯」予以刊載，以嘉惠學界。特此說明本論文刊載之緣起，並向高綱教授深致謝意。

陳登武 謹識

** 日本大學大學院總合社會情報研究科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1930 年代「國際都市」上海的外國僑民來自 40 餘國，人數超過 5 萬人，這些多民族、多國籍的住民並未融合，而形成所謂「拼圖式的都市」。據 Edgar Snow 之觀察，上海的外國人未見「人種的融合」，住在中國人當中的任何國家的僑民社會均保持「與本國許多地方都市相同樣貌的特異性」。¹亦即是上海的外國僑民社會是未有異文化交流之各國人封閉性聚落的複合體所構成，其中，日本僑民社會可說是封閉性聚落的典型。²

本文擬究明近代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實況。尤其是藉由探討日本僑民社會的形成、社會組織，以及經濟「權益」，以解明上海外國僑民社會中維持被認為具特別強烈封閉性和排外性的日本僑民社會特性之要因。

二、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形成

（一）日本僑民的增加

過去日本人在中國最集中之地為東北地區，但若就中國關內（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觀之，則上海最多。據 1932 年上海事變爆發時的統計，東北地區（含關東州）的日本人有 268,982 人，而關內的日本人有 54,016 人，其中上海有 24,235 人。上海的日本人占關內日本人近半數，其次，青島有 14,228 人、天津 5,606 人。³

日本人最早出現在上海乃是 1871 年簽訂「日清修好條規」（譯按：即中日修好條約（而展開外交關係之後。1872 年正式在上海開設日本領事館（1891 年升格為總領事館）。1875 年三菱商會開辦

¹ Edgar Snow, *Far Eastern Front* (London: Jarrolds, 1934), pp.172-173; Edgar Snow 著、棍谷善久譯《極東戰線》（東京：筑摩書房，1987年），頁124-125。

² 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係極為封閉一事，亦可從上海日本僑民關係者的口述訪談調查充分印證。另參閱陳祖恩〈西洋上海と日本人居留民社会〉，收入大里浩秋、孫安石編《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

³ 參閱副島圓照，〈戰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稿）〉，《和歌山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第33集（和歌山市，1984），頁24。

橫濱⇔上海定期航路，1877年三井洋行開設上海支店。1876年淨土真宗本源寺開設上海別院以傳教。⁴

明治元年至四、五年之際，僑居上海的國人(譯按:日本人)不過十人乃至百人，每年平均增加五、六人。而不管什麼時代，大凡男女之比例為一比二。男性大多數是賣雜貨、陶器、小日用品等之商人，接著依序是商社員工及官吏；女性約六七成從事以外國人為對象的娼妓。……這些娼妓的一部分可能是前來上海發展的日本人的先驅。⁵

1887年日本僑民數達250餘人，接著1890年之際，據稱：「英、美、法三租界的外僑約4,200人，其中，我國人(譯按：是指日本人)為644人(男339人、女305人)、戶數58戶，租界的中國官民合計15萬人。」⁶像這樣增加的僑民多數為「在內地(譯按：指日本國內)生活無著的賤民」「其中女子除了少數之外，都靠洋人或清人維生」。⁷當時，日本人大都居住在舊英租界開店，且「至明治末年為止，在英租界從事貿易的國人(譯按：指日本人)，常居住在其店鋪中，而不像現在每天從虹口前去上班」。⁸

由表一顯示，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僑民數約1,000人，開戰後，除了留下200餘人外，其餘的全部返回日本。戰後，返回日本者再度回到上海，又有新來者，因此1899年末日本僑民增為1,088人。從此之後，虹口地帶開始「以領事館及東本願寺為中心日本人聚集，……日商紛紛在清商之間開店」。⁹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同月12日上海道台宣布上海局外中立。6月末日僑數為

⁴ 譙樞銘，〈進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会，《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出版地不詳：該會，1988)；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42)，頁39-46。關於初期上海日本僑民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角色，可參閱陳祖恩，〈明治時代的上海日本居留民〉，《上海文化》，1995：1(上海，1995.1)。

⁵ 池田桃川，《上海百話》(上海：日本堂，1921)，頁1-2。

⁶ 《上海新報》(上海)，第1號，1890年6月5日，5版。

⁷ 《上海新報》(上海)，第21號，1890年10月25日，12版。

⁸ 米澤秀夫，《上海史話》(東京：畝傍書房，1942)，頁207。

⁹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76。

2,525 人，上海日本人的商業呈活絡狀態，僑民逐月增加，同年末已超過3,000人。¹⁰

表一 1893~1949 年上海日本人統計

年度	男	女	合計	年度	男	女	合計
1893	477	389	866	1920	7,689	6,831	14,520
1894				1921	8,228	8,490	16,718
1895	386	220	606	1922	8,898	8,722	17,620
1896	488	285	773	1923	8,404	8,356	16,760
1897	492	331	823	1924	9,779	8,139	17,918
1898	593	339	932	1925	10,547	8,963	19,510
1899	698	390	1,088	1926	11,190	9,404	20,594
1900	737	435	1,172	1927	15,049	10,869	25,918
1901	935	538	1,473	1928	16,313	10,228	26,541
1902	1,207	684	1,891	1929	15,896	10,666	26,552
1903	1,427	789	2,216	1930	13,927	11,180	24,207
1904	1,961	1,077	3,038	1931	13,087	11,148	24,235
1905	2,739	1,592	4,331	1932	15,006	11,718	26,724
1906	3,774	2,051	5,825	1933	15,113	11,788	26,901
1907	3,950	2,318	6,268	1934	15,021	11,789	26,810
1908	4,477	2,848	7,325	1935	12,712	11,279	23,991
1909	4,984	3,073	8,057	1936	12,565	11,048	23,613
1910	○●4,761	2,921	7,682	1937	12,585	11,087	23,672
1911	3,862	3,174	7,036	1938	19,520	15,156	34,676
1912	4,375	3,342	7,717	1939	30,322	20,771	51,093
1913	5,028	4,065	9,093	1940			65,621
1914	6,237	4,901	11,138	1941			87,277
1915	○●6,356	5,101	11,457	1942			92,676
1916	5,994	5,178	11,172	1943			103,968
1917	7,215	6,182	13,397	1944			102,442
1918	6,907	6,973	13,880	1945			72,654
1919	9,871	7,849	17,720	1949			441
備註	「○●」係指含朝鮮人、臺灣人。						

參考資料：副島圓照，〈戰前期中國在留日本人口統計（稿）〉，《和歌山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科學》，第33集，頁24。

¹⁰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84-85。

中日甲午戰後，重新簽訂「日清通商航海條約」（譯按：即中日通商條約），日本不僅獲得領事裁判權和租界設定權，並獲得向來任何歐美各國所未取得的長江航行權、通商口岸設立工廠權，而確保輸出資本之權利。¹¹當時，日本尚未具備輸出資本之能力，所以該條款對日本並未立即產生作用；日俄戰後，日本開始向中國輸出資本，以紡織業為主，製粉、機器、榨油等日本資本正式開始進入上海。隨著貿易的擴大，日本有力的企業開始在上海設支店。而且上海的日僑激增，為日本僑民社會亦帶來重要的轉機。

要之，初期的上海日本僑民大多數是單身出外工作者，男性係以日本人為對象的零售商人，女性則是所謂「唐行婦（譯按：原文稱からゆきさん）」。¹²上海的日本僑民社會開始形成是中日甲午戰後，其正式化則是日俄戰後。

由於日俄戰後的好景氣，像內山完造那樣從藥的小販開始想要開創一番事業者，或期望日本人日益增加而經營旅社、餐館者隨之增加。其後，日本大企業的上海支店或出張所漸漸增加，在那裡上班的人及其家族亦開始在上海生活。1905年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有4,331人，4年後增為8,057人，上海的日本僑民社會開始正式形成，1907年上海居留民團的成立可說其象徵。¹³然而，當時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中多數住民是每日生活窮困者，在公司等場所上班靠月薪生活而較安定的中產階級很少，可說其社會尚未成熟。¹⁴

¹¹ 藤村道生，《日清戦争》（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203-207。據「日清通商航海條約」，日本在中國擁有與歐美列強相同之特權，獲得領事裁判權及租界設定權。

¹² 關於上海的「唐行婦」（日本人娼婦）之實況，參閱森崎和江，《からゆきさん》（東京：朝日新聞社，1976）。此外，關於上海的「からゆきさん」（東洋妓女），參閱唐權，《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東京：新曜社，2005）。

¹³ 上海居留民團成立的契機係隨著「居留民團法」之實施而來。參閱木村健二，〈在外居留民の社会活動〉，收入《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39-41。

¹⁴ 桂川光正，〈上海の日本人社会〉，《国際都市上海》（大阪：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1995），頁54。

上海的日本僑民社會走向成熟期的轉機，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大戰期間，西方列強不得不暫時退出中國，英法等國人爲了從軍紛紛從上海返國。對日本而言，可說是良機來到，日本資本以紡織業爲中心向上海躍進，日資工廠明顯地增多。¹⁵而且，趁大戰爆發後歐美在中國的貿易大幅縮小之機，日本對中國的貿易激增，上海成爲中日貿易的據點，設於上海的日本商社支店及在上海的日本商人活躍地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時期，日本的大銀行亦相繼進入上海，1919年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正式成立。¹⁶上海日本僑民亦隨著增加，1915年有11,457人（超過英國僑民而居外僑的第一位），大戰結束的1919年已達17,720人。¹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的日本僑民激增，乃是從日本國內派遣的公司員工、商店員工等增加，以及期望景氣好及日僑增加而打算針對日僑做生意的人流入所致。E. O. Hauser 所描述當時上海日本僑民之狀況如下：

他們悄悄地搭日本船來到，帶著溫柔的妻子和可愛的孩子們，住在租界的北部，那裡有日本人的商店、飲食店及學校。他們若無必要不到其他外國人所住的蘇州河之對岸。當然，工作上則有必要前往。因為日本的三井、三菱、日本郵船、大阪商船、橫濱正金等大企業的事務所在上海中心部或碼頭。然而，日本人的生活圈限於所謂租界中的日本人區域，而不與其他國的人交往。¹⁸

如後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迄1920年代，上海的日本僑民社會是以少數的精英階層、公司職員、銀行職員等薪資生活

¹⁵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 473.

¹⁶ 上海商業會議所係1911年成立的上海日本人實業協會所改名，關於其重要人物的活動，參閱山村睦夫，〈上海日本人實業協會役員層の分析〉，《和光經濟》，26：3（東京，1994.3），頁113-129。

¹⁷ 關於「1893-1939年上海日本人總數統計」，參閱副島圓照，〈戰前期中國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稿）〉，頁24；關於「1843-1949年上海外國人人口統計」，參閱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41。

¹⁸ Ernest O.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Harcourt, 1940), pp. 126-127.

者為中心的中產階層，以及定居虹口地區的一般民眾階層所構成。

（二）虹口地區¹⁹

一般而言，蘇州河以北之地稱為虹口，過去是美國租界。明治初期日本人來到上海時，虹口地區「尙未有文路、吳淞路、北四川路，百老匯路之外是一片田園，……日本人當時大多居住在英法租界」。²⁰中日甲午戰後，許多日本人住在虹口，1904年虹口的中心街百老匯路（Broadway）乃所謂「日本人的雜貨店頗多，……逐漸繁榮的Broadway看起來像日本人街」。²¹日本人居住在虹口後，最初大多聚居在文路（今塘沽路），從此之後，文路是日本僑民最多的街。據1915年的調查，當時文路的日本僑民有851人，其次依序是吳淞路515人、崑山路295人、南潯路235人。日俄戰後十年間激增兩倍的日本人亦住在北四川路越界區（1903-1904年間建造的江灣路、黃陸路）。此一地區發展成為日僑的住宅區。²²

多數上海日本僑民都分散地住在出租的中國式或中西折衷式的小房子。而租賃家屋若「不適合日本人居住」，就隨便改造成日本式，以致與房東發生糾紛。²³日本人乃是採完全堅持日本式，而不與中國民眾妥協的態度。²⁴最初，到上海的日本人大多單身或未帶子女的夫婦，因此1910年代有10家日本人經營的旅館、20家出租房，以及24家日本飲食店和遊廓。²⁵到上海的日本人因地理關

¹⁹ 關於虹口地區的綜合敘述，參閱參閱上海市虹口區志編纂委員會編，《虹口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²⁰ 池田桃川，《上海百話》（上海：日本堂，1921），頁5。

²¹ 《上海日報》第101號，1904年7月11日，4版。

²² 米澤秀夫，《上海史話》，頁207。

²³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00-101。關於上海日本僑民堅持榻榻米、日本式的壁櫥、日本式客廳中的壁龕以及廁所或浴室等「對傳統日本人家屋而言是理想的設備」一事，參閱村松伸，《上海·都市と建築》（東京：PARCO出版，1991），頁336-343。

²⁴ 小沢正元，《內山完造伝》（東京：番町書房，1972），頁46。

²⁵ 關於上海的日本人旅館，參閱杉江房造編，《新上海》（上海：日本堂書店，1918年），頁207。據該書〈上海の日本人料理屋と芸妓〉一節（頁136-137），當時上海有日本飲食店24家、日本人藝妓200人。

係，以長崎爲首的九州出身者居多。²⁶

據 1924 年以日本人爲讀者而出版的旅遊指南《上海案內》一書，虹口地區「百老匯路及北四川路有許多支那商店。尤其市場附近的文路、漢壁禮路、吳淞路、閔行路、密勒路、崑山路滿街都是日本商店，幾乎可說是日本街，日本國內小都市的各種商品銷路完全比不上本地。宣稱上海的本邦人（譯按：指日本人）現在已有 20,000 人，其中多達九成居住在本虹口，因此許多支那人靠日本人做生意而過生活，從貨幣兌換店、雜貨店、米炭店、食品店、和服店及鮮魚蔬菜店等，呈現未有一家商店不使用日語的現象」。²⁷另外，北四川路的橫濱橋以北被認爲日本公司的「宿舍居多，上海邦人（譯按：上海日僑）公司職員多達八成即居住在此地」，1922 年北四川路上的電車終點站一帶建設日僑住宅地千愛里，誕生「新日本人町」。²⁸

像這樣，日本僑民在虹口開店，開辦學校和醫院，建設寺廟及神社、電影院及戲院，組織日本居留民團和日本人俱樂部。（參見附錄）

那裡亦設置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駐紮軍隊。然而，必須留意的，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以前，虹口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居住地。如上引《上海案內》一書所指出的，雖然當時已有許多日本僑民居住虹口，亦可只使用日語、以日本的方式生活，充分具備「日本人町」的條件，但其實是壓倒性多數的中國人居住而以日本人爲對象做各種小生意。例如，米澤秀夫亦認爲，連被認爲「租界中的日僑密集地帶」吳淞路，日本僑民激增而「完全帶有日本人町的樣貌，大概是上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

²⁶ 據內山清等編，《大上海》（上海：大上海社，1915），「可稱爲上海日本町的文路、吳淞路、南潯路、崑山路、乍浦路、北四川路等方面開店者，其中以九州一帶者居多，又，來自島原、天草等地的女性最多，……他們出身地的風俗因此移入上海」（頁 130）。1923 年開辦長崎-上海定期航路後，長崎出身者可能因而激增。NHK「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取材班編，《上海共同租界》（東京：角川書店，1986），頁 38。

²⁷ 島津四十起編，《上海案內（第 10 版）》（上海：金風社，1924），頁 45-46。

²⁸ 島津四十起編，《上海案內（第 10 版）》，頁 50-51。

事變)以後的事」;²⁹而且,北四川路本來是「廣東人的根據地,有粵妓,又有廣東戲院,昭和7年(1932)事變爆發以前,因支那人而帶來非常大的繁榮,但其後腹地的閘北一度被燒後,顯然變得較為沒落」。³⁰

虹口地區的中國人及其商店隨著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以一二八事變)及第二次上海事變(即八一三事變)爆發而被驅逐,其結果虹口急速向日本化進展,在景觀上亦變成「日本町」。例如,據1940年1月之調查,北四川路有使用的家屋703家中,日本人經營的餐館、餐廳、café(譯按:原文稱「カフェー」,日本大正至昭和年間的娛樂場所,有女服務生提供客人洋酒)、咖啡廳等飲食店有127家,設有霓虹燈的店家有150家,日本人商店600家,占全街店家近9成,較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前的65家增加約10倍。³¹

至於中國人如何看待上述虹口地區的日本化?茲介紹關於虹口的「東洋街」(當時中國稱日本為「東洋」)之回憶,到了1920年代,日本的房地產商在今海倫路(471-531號)建造日本式住宅區,讓日本僑民居住。後來這一帶漸次繁榮,被中國人稱之為「東洋街」。

那兩端入口設有木造的門,只有小小的門可以進出。若中國人進入,則被日本小孩罵,甚至被丟石頭或瓦片。中國人為何不能走進中國的土地。人何時極為蔑視別人。因弱國之民,被他國的小孩如此侮辱。在「東洋街」西方的橫濱橋,當時「東洋小學生」和「日本海軍陸戰隊」3-4人或4-5人成隊伍炫耀而旁若無人地走著。好像這裡是他們的殖民地,中國人是他們的臣民。³²

目前,中國的研究者指出日本僑民控制虹口地區的過程,其歷史

²⁹ 參閱〈日本人街の出現〉,《上海史話》,頁206-209。

³⁰ 米澤秀夫,《上海史話》,頁207。

³¹ 米澤秀夫,《上海史話》,頁208。

³² 杜紹文,〈虹口「東洋街」之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虹口區委員會,《虹口史苑》(上海:該會,2001),頁519-520。

認知可說是客觀的，茲介紹如下：

虹口並不是日本租界，但實質上變成日本租界。其結果，導致「一二八事變」及「八一三事變」，而成為兩度淞滬戰爭的爆發地。甚至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策源地。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虹口變成日本軍占領地區，名副其實地成為日本的殖民地。³³

(三)「會社派」與「土著派」

進入 1920 年代，以上海一長崎定期航路開設為後盾的日本僑民持續增加，1926 年其人數突破 2 萬人，據 1927 年 12 月底的調查，上海日本僑民有 25,827 人，占上海外僑總數 54,388 人之 47%。接著，依序是英國人 10,775 人占 19%、俄國人 6,587 人占 12%、美國人 3,573 人占 6.6%、葡萄牙人 1,673 人占 3%、法國人 1,485 人占 2.6%、德國人 1,265 人占 2.3%。³⁴

據 1927-1928 年之各種調查，上海總人口為 2,717,423 人（中國人 2,669,663 人、外僑 47,760 人），其中，租界外華界有 1,503,970 人（中國人 1,494,587 人、外僑 9,383 人）、共同租界有 858,685 人（中國人 827,075 人、外僑 31,610 人）、法國租界有 358,453 人（中國人 348,076 人、外僑 10,377 人）。據 1928 年 12 月底之調查，上海日本僑民有 26,518 人（戶數 5,869 戶、男 16,296 人、女 10,222 人），租界外華界有 6,399 人（占當地外僑之 68%）、共同租界有 19,852 人（占 63%）、法國租界有 267 人（占 2.6%）。日本僑民占上海總人口之 1.2%，其他外僑則占 0.8%、中國人占 98%。³⁵

日本僑民居住在共同租界者占 73.4%、租界外華界者占 24.2%、法租界者占 2.9%。表二為上海各路日本僑民居住分布狀況（詳見表二）。當時稱為「日本人租界」的虹口地區，以住在吳淞路者最

³³ 周志正，〈日本人在上海〉，收入《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史志資料選輯》，第 12 輯（上海：上海市虹口市志辦公室，1994），頁 59。

³⁴ 1927 年 12 月末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調查「列國上海在留民統計」。佐藤貞之，〈上海在留日本人口調查〉，《支那研究》，20（上海，1929.7），頁 174-175。

³⁵ 佐藤貞之，〈上海在留日本人口調查〉，頁 172。

多，其次為北四川路者。就其比例觀之，虹口方面占 27.4%、北四川路方面 25.3%、楊樹浦方面 14.6%、舊英國租界及法國租界一帶 3.3%。過半數的日本人住在以吳淞路及北四川路為中心的共同租界北方周邊一帶，住在共同租界中心部的舊英國租界者為數甚少。

表二 上海各路日本人分布表（據 1929 年 10 月底上海日本總領事館之調查）

東部（楊樹浦方面）	戶數	人口
楊樹浦路·公平路·韜明路·培開爾路·保定路·匯山路	172	1,042
大連灣路·茂海路·舟山路·麥克利克路一帶·昆明路附近一帶	32	424
華德路（康泰織布廠）附近	29	448
上海紗廠員工宿舍及其附近	29	127
東華工廠宿舍及其附近	26	585
公大紗廠員工宿舍及其附近	31	715
裕豐紗廠及其附近	21	218
大康紗廠及其附近	29	326
同興紗廠員工宿舍及其附近	11	154
小計	335	4,041

中部（虹口方面）	戶數	人口
文路·西華德路附近一帶	46	268
閔行路·新康里·密勒路之各一部分	115	807
南潯路及華德路一帶	125	521
文路一部分·日本人俱樂部附近	42	252
乍浦路（天潼路·北靶子路以南海寧路的一部分）	121	623
北蘇州路（海寧路、北四川路、靶子路的一部分）	31	181
赫司克而路全部及其附近	40	192
吳淞路·漢壁禮路·崑山路的一部分	188	945

崑山路的一部分和義豐里的一部分	59	202
吳淞路（崑山路以北·湯恩路以南·海寧路·鴨綠路一帶）	265	1,015
靶子路（從吳淞路口至赫司克而路）	122	722
吳淞路的一部分及東興里的一角落及附近	53	420
鴨綠路·斐倫路·密勒路·瑪禮孫路一帶	158	885
東有恆路·東鴨綠路·梧州路·狄思威路附近一帶	83	470
西嘉興路一帶（德香里·厚德里·映生里·中國市場附近全部）	159	529
虬江路（長吉里·厚德里·太富里·松柏里一帶）	160	672
東寶興路（順慶里·余潤里·邢家一橋一帶）	181	528
海能路（大安里·寶德里一帶）	23	150
小計	1,997	7,582

北部	戶數	人口
北四川路（厚德路·靶子路及其附近一帶）	236	586
北四川路（三義里·福德里·大德里·崇德里·戈登里）	170	330
北四川路（丁興里之一部分·禁里·厚福里）	92	194
東寶興路（克明路·順天里·福壽里）	105	281
北四川路（西土慶里·順天里·明通里）	62	226
餘慶坊及其鄰接地一帶	168	338
北四川路（阿瑞里及其附近）	36	188
北四川路（吟推路東安樂里·西安樂里·榮華里）	226	792
北四川路（海倫庭及其附近）	39	153
北四川路（木蘭庭及其附近）	55	306
寶樂安路全部及其附近	61	391
北四川路（橫濱橋以北電車終點站·東慶里·永安里）	91	262
北四川路（西崇福里一帶及其附近）	75	181
北四川路（東豐里·志安坊·紀家花園及其附近）	72	269

東橫濱里一帶及其附近	258	592
東橫濱路德培里及其附近一帶	190	319
狄思威路（楊家濱路·慶揚路·狄思威里·祇園·祥茂里·增金里·月廼家花園）	163	221
施高塔路（東照里·公園里·千愛里·恆豐里及其附近）	95	672
黃羅路·朝日街附近一帶	55	209
開北（東將灣路·花園街·大和街·中興街·環生路·祥瑞里·大東街·問濟路·寶山路·顏家灣路·恆蒙里）	62	266
開北（江灣路大東街附近一帶）	18	82
小計	2,458	7,019

南部（舊英租界·法租界）	戶數	人口
江西路·福州路·廣東路·河南路及附近一帶	172	394
四川路·漢口路·九江路及附近一帶	85	146
霞飛路附近一帶	58	335
小計	315	875

西部	戶數	人口
日華紗廠（含喜和、嘉豐）及員工宿舍附近一帶	291	1,527
內外棉紗廠員工宿舍、集訓所及附近一帶	191	636
同興紗廠員工宿舍附近一帶	104	287
小計	586	2,450

居住其他各地者概數	戶數	人口
總領事館工部局宿舍、銀行紡織公司之外的公司工廠、東亞同文書院	224	3,045
上述以外的單身者及未申報者	53	876
小計	277	3,921

表三 上海日本僑民職業類別表（據 1928 年 10 月底上海日本總領事館之調查）

	男	女	合計	家屬 (男)	家屬 (女)	家屬數
日本人本業者	1,0627	2,935	13,562	5,139	7,841	12,980
朝鮮人	431	228	659			
臺灣人	375	117	492			

職業類別	男	女	合計	家屬 (男)	家屬 (女)	家屬數
農業園藝牧畜業	9	0	9	11	24	35
農業園藝牧畜業勞工	0	0	0	0	0	0
木匠水泥匠石匠油漆匠	54	0	54	42	69	111
製版印刷裝訂業	35	0	35	36	64	100
學藝娛樂裝飾品製造	29	3	32	21	28	49
瓦斯電力及天然能源利用業	14	0	14	16	24	40
其他工業	24	0	24	23	37	60
工廠勞工	165	0	165	103	136	239
物品販賣業	1,389	73	1,462	579	836	1,415
貿易商（不含店員和公司員工）	214	0	214	114	238	352
金融保險業（不含店員和公司員工）	32	0	32	41	53	94
漁業製鹽業勞工	46	0	46	8	15	23
窯業	11	0	11	15	27	42
金屬工業	21	0	21	24	35	59
機器器具製造	13	0	13	26	33	59
化學工業	6	0	6	10	15	25
纖維工業	19	0	19	23	37	60
洗衣染色	25	1	26	31	43	74
紙工業	7	0	7	12	16	28
皮革骨頭羽毛品類製造	9	0	9	15	23	38

木頭竹子類製造	16	0	16	29	46	75
飲食品嗜好品製造	39	0	39	42	53	95
被服裝飾品製造	97	53	150	87	124	211
土木建築業	28	0	28	21	35	56
仲介業	62	0	62	59	63	122
物品出租及保管業	15	3	18	20	28	48
公司銀行商店員工	4,982	94	5,076	2,274	3,396	5,670
旅館飲食店宴會場出租藝妓遊戲場娛樂場	102	77	179	104	122	226
藝妓娼妓女侍等	0	628	628	11	15	26
理梳髮店澡堂等	98	42	140	59	107	166
其他商業	364	6	370	173	246	419
郵政電信電話業者	1	3	4	2	2	4
馬車業司機	16	0	16	11	14	25
船舶業員工	113	0	113	78	115	193
運輸業者	26	0	26	32	49	81
搬運工	52	0	52	30	37	67
陸海軍人	4	0	4	5	8	13
官公吏雇員	316	6	322	159	315	474
宗教工作者	32	2	34	16	29	45
教育工作者	123	22	145	83	122	205
醫務工作者	166	224	390	133	237	370
法務工作者	12	0	12	9	21	30
記者通信業者作家畫家雕刻家攝影師	46	7	53	33	44	77
其他自由業者	99	11	110	35	63	98
其他有職業者	326	146	472	176	291	467
家中傭人	356	542	898	106	194	300
學生訓練生	402	240	642			
在監獄服刑者	14	14	28			
其他未申報有無職業者	492	749	1,241	153	216	369

資料來源：佐藤貞之，〈上海在留日本人口調查〉。

舊英國租界有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臺灣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住友銀行、三井物產、日清汽船、日本郵船、日本棉花等日本的大銀行和企業，以及其相關人士居住。³⁶居住舊英國租界之日本人是日本僑民中被稱為「會社派」的精英階層。在虹口、閘北多數是日本人經營的中小企業、商店、飲食店、旅館、其他雜店，居住在這裡的日本人是日本僑民中被稱為「土著派」的一般民眾。³⁷據上海居留民團長福田千代作之回憶，日本僑民中產生「土著派與會社派的分別」，而自1920年代起看到「有相當激烈的競爭，民會亦有糾紛」。像「土著派」與「會社派」的日本僑民社會對立發生之原因有二：其一，「第一次大戰後進入中國的日本企業，尤其是紡織工業進入上海帶來日本僑民顯著地增加，僑民的增加使日本人社會複雜化」；其二，因「當時僑民逐漸認識自治體的政治知識」。³⁸

關於上海日本僑民 27,660 人（含當時「日本帝國臣民」的朝鮮人、臺灣人）的職業結構，參見表三「上海日本人職業類別」。有職業者（不含學生、受刑者、未申報者）人數 12,802 人（男 10,525 人、女 2,277 人），其家眷數為 12,611 人（男 4,986 人、女 7,625 人）。可推測有職業者中半數以上有家眷。日本人的職業占最多數的公司、銀行、商店員工有 5,076 人（占有職業者的 39.7%），若含家眷則有 10,746 人（占上海日本僑民的 38.9%）。主要雇用他們的貿易商、金融及保險業經營者有 246 人，若含家眷則有

³⁶ 榛原茂樹、柏正彦，《上海事件外交史》（東京：金港堂書籍，1932），頁99-100。

³⁷ 關於上海日本僑民中「會社派」與「土著派」之對立，白井勝美指出：「吳淞路是租界中日本人密集的地帶。以吳淞路為中心，虹口有許多日本人。然而，大公司或銀行在英租界。因此居留民團中分為英租界派與虹口土著派。最初，上海居留民團的核心是英租界派人物，例如郵船（譯者按：海運公司）的支店長、銀行的支店長、滿鐵的支所長等均是，其中虹口的土著派漸漸地提出意見，表示其本身才是日本僑民的主流。……上海的僑民小學校之經營是居留民團負責的，其經費究竟由誰負擔？結果，紡織業者付出最多。其次是銀行、公司，剩下約兩成為一般人。不過，由人數觀之，土著派占壓倒性多數。因此，有一部分居留民對英租界派掌握權力之不滿可能非常強烈吧。」以上參見 NHK「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取材班編，《上海共同租界》（東京：角川書店，1986），頁188-189。

³⁸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101。

692人（占2.5%）。次於公司、銀行、商店員工的物品販賣業有1,462人（占10.8%（，若含家眷則有2,877人（占10.4%）。其他有職業者為傭人896人、藝妓及娼妓628人、官公吏及其雇用人322人。此外，無職者及未申報職業者多達1,241人。

就上述的日本僑民居住地分布及職業結構觀之，上海日本僑民可分為約占3%的「會社派」精英階層、約占40%的「會社派」中間階層、其餘的「土著派」一般民眾。³⁹精英階層為貿易公司員工、銀行支店長、高級官吏、公司經營者等，住在舊英租界及法租界。中間階層以在紡織公司、銀行、貿易公司上班的月薪生活者為中心，他們大多住公司宿舍或豪華公寓。一般民眾則為中小商人、中小工業的老闆和員工、飲食及服務業者、各種雜業者、無業遊民，主要住在俗稱「日本租界」的虹口及華界的閘北。精英階層絕對不會埋骨在上海。他們大多在上海待大約兩、三年就轉任巴黎、紐約等地的支店長。他們住在高級住宅或豪華公寓，亦有人在法租界擁有別墅，雇用中國人的「傭人」或「阿媽」，其中亦有帶日本女傭前來的。他們與歐美人的公司老闆「大班」亦有商業上的往來，然而加入英國人所組織「上海俱樂部」的只有在華紡聯合會專務理事船津辰一郎和聯合通信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二人。⁴⁰

在紡織工廠上班的日本人員工住在滬西小沙渡及楊樹浦方面等的工廠宿舍。該宿舍以高的圍牆區隔中國人居住區，其中有日本式住宅和庭園、稻荷神社、網球場、箭道場等。⁴¹

在貿易公司、銀行等上班者從虹口北部的宿舍或公寓通勤。

³⁹ 關於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1991年10月在上海舉辦「紀念上海縣城7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者提出「在上海的日本人」一文，首次分為「會社派」精英階層、「會社派」中間階層、「土著派」一般民眾等，該論文刊登在《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其後，作者的看法和數據直接被收錄在中國出版之《虹口區志》及《上海市地方志》等書籍。另外，作者過去推測「會社派」精英階層占上海日本僑民之5%，然而，據表二「上海各路日本人分布表」，得知居住在舊英法租界的日本人有875人，因此比例改為3%。

⁴⁰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上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頁135。

⁴¹ 陳祖恩，〈西洋上海と日本人居留民社会〉，頁212。

住在「日本租界」的日本民眾大多數住改建為日本式的住宅，在虹口的三角地市場購買從長崎運來的新鮮魚和蔬菜，過著與日本國內同樣的生活。曾住在虹口的長崎縣人回憶表示：那裡是「將長崎街的一角原原本本地搬過來的」，有魚店、賣蔬菜的、賣和菓子的、和服店、木屐店等，「住在那裡的日本人忘記是在外國生活」。⁴²此外，有西洋人 E. O. Hauser 觀察虹口地區的日本人的生活狀況，表示：

大多數的日本人住在虹口。在蘇州河北邊一帶，他們形成自己的社會——「小東京」。日本的小販、小貿易商住在將中國房屋改建為日式房屋中。他們過著跪坐在榻榻米上、泡熱水澡、在客廳不穿鞋子的生活。他們教中國的「傭人」做天婦羅和壽喜燒，要他們前往虹口市場購買剛從九州運來的新鮮魚、螃蟹、醬油、蠶豆、茼蒿、生姜、日本蔬菜等。他們在乾淨的店販賣日本製的木棉、玩具、唱片、腳踏車，以及許多中國商品。工作時間結束時，Sato 先生到 Kato 先生處，兩個人一起到居酒屋喝 Asahi 啤酒。而亦說不定可能某夜到平價的日本飲食店聽熟識的藝妓 Tomoko 小姐和 Mitsuko 小姐談小道消息、彈奏三味線。

此一期間，Sato 太太和 Kato 太太在家裡處理家事，教育小孩，使其不輸給日本小學校的同學 Kobayashi 先生的孩子。當明治節等日本節慶來臨時，全家到日本的神社參拜，當兒童節來臨時，他們家的 Taro 小弟弟要求媽媽買鯉魚旗給他，綁在木棒上飛揚。

在蘇州河南岸的三井及橫濱正金銀行上班的日本員工下午四時搭乘人力車回到「小東京」。他們大多住在那裡的公寓。然而，他們還是吃日本的食物，盡可能在榻榻米上休息，喜歡本國的休閒方式。⁴³

⁴² 〈上海想い出の隨想〉，收入《上海在留邦人が造った日本人街》（長崎：日中兩國人民朋友會，1994），頁165。

⁴³ Ernest O.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pp. 193-194.

上述 E. O. Hauser 的觀察可以說確切掌握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而發展、成熟的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之狀況，尤其是以月薪生活者為中心的「會社派」中間階層生活的樣貌。

三、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之組織

（一）日本僑民的地位

上海的日本僑民能以有利的條件加入最初由英國主導的歐美列強在中國貿易而形成的「非正式」帝國據點——上海租界之寄生者，然而，因中日甲午戰爭而獲得治外法權後，他們成為上海租界的參與者。⁴⁴儘管如此，由於他們是上海租界較晚的加入者，而被納入歐美人壟斷行政權的租界當局管轄下，直到上海租界被日軍控制為止，始終無法完全脫離邊緣者的性格。

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因對中國享有條約上的治外法權，而與完全享有治外法權的其他外國人站在同樣的立場。因此，站在受駐上海總領事的監督和保護的立場。總領事公布 1.僑居規則；2.警察犯處罰令；3.其他各種營業管理規則；4.關於學校之規則等各種法規，從事行政上的管理，擁有 50 名以上的警察以直接保護日本僑民。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在黃埔路 25 號，總領事之下設有領事、副領事及領事館警察署長等。⁴⁵

為了保護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維護其權益及防衛租界，在上海有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固有兵力 672 名，1931 年 10 月增為 908 名）常駐。稱之為「上海陸戰隊本部」的司令部在租界外（閘北）的江灣路 10 號。⁴⁶此外，為了同樣目的，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以 6 艘軍艦組成，1922 年 2 月增為 11 艘）駐守長江方面（上海、吳淞沖、長江口附近、鎮江、南京）。⁴⁷

⁴⁴ Beasley, W. G. 著、杉山伸也譯，《日本帝國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16-17。另，關於此一情況參閱該書的序章。

⁴⁵ 米澤秀夫、浜田峰太郎編，《大上海要覽·案內》（上海：上海出版社，1935），頁 242-243。

⁴⁶ 米澤秀夫、浜田峰太郎編，《大上海要覽·案內》，頁 233-234。

⁴⁷ 高橋邦夫，《帝國海軍と上海事変》（東京：日本評論社，1932），頁 34-36。

以下，茲檢討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組織的形成過程及其性質。

(二) 上海居留民團

上海居留民團係依 1905 年 3 月發佈之法律第 41 號「居留民團法」與 1907 年 4 月發布之外務省令第 2 號「居留民團法施行規則」，加上同年 8 月發佈之外務省告示第 18 號規定其設立和管轄區域，而於 1907 年 9 月 1 日成立。上海居留民團設立的法律根據「居留民團法」規定如下之項目。

依居住在專管居留地、各國居留地、雜居地等帝國臣民之狀況，外務大臣認為必要時，得以居住在規定區域內的帝國臣民組織居留民團；居留民團為法人，受領事、公使及外務大臣的監督（但視土地的情況而得以省略第二層的監督），在法令或條約範圍內處理其公共事務及法令條約，或按照慣例處理其所屬相關事務。⁴⁸

要之，異於日本國內地方政府之下的市町村，居留民團係未擁有固定的行政權、受外務省監督（在上海是總領事）的「自治團體」之一。⁴⁹

隨著上海居留民團的設立，1905 年 12 月設立之其前身「上海日本人協會」被解散。接著，上海居留民團接管所有日本人協會經營的事業（上海開導尋常高等小學校、墓地火葬場、日本義勇隊及其他事業等）。⁵⁰

在法律上，上海居留民團有以下之規定：

上海居留民團係居住在離上海各國共同居留地、法國專管居留地及該各居留地界線兩英里以內的地區（含浦東）內

⁴⁸ 林源三郎，〈上海居留民團〉，收於《支那研究》，19（上海，1929.5），頁91。

⁴⁹ 中内二郎，《居留民團の研究》（上海：三通書局，1941），頁25。

⁵⁰ 上海日本人協會依 1905 年 12 月 17 日上海日本總領事館所舉行的日本人俱樂部和日本實業俱樂部聯合總會之議決，設立學校及日本義勇隊，以及其他經營慈善救濟事業的公共團體。（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 107-112）。

的日本帝國臣民所組成,其法律上的性質為公法人。⁵¹

上海居留民團的機關是由議決機關的居留民會和理事機關的行政委員會所構成。居留民會議員係在居留民團地區內的「帝國臣民」或擁有事務所的「帝國法人」繳納「每月墨西哥銀兩圓以上」的居留民團課金（所得稅、營業稅）6個月以上者。民團設立之初，具有民會議員資格者有273人，隨著居留民之增加，有資格者亦增加，1915年有403人、1920年有910人、1924年有1,584人。依1925年1月公布之「領事館令第一號」，居留民團議員定額限為610名，任期兩年。議員有權者的條件不變，但從登記在行政委員會確定之選舉人名簿上的有權者中選舉之。1925年2月的上海居留民會議員選舉的狀況如下：議員定額60人、有權者總數2,981人、投票總數2,577人。

行政委員會係代表居留民團，並處理其事務的理事機關，在每年舉辦之居留民會通常會上由民會議員中選出15名（1924年起變更為10名以下）的行政委員組成。在行政委員會上從行政委員中選出講長、副講長、會計主任。⁵²居留民團在財政上往往依賴紡織公司等大企業，因而行政委員會主要由居住在舊英租界之公司高層人士、銀行支店長等「會社派」精英階層所構成。⁵³1921-1922年間發生的小學校新設問題（代表「會社派」之意見的行政委員會決定在楊樹浦新設小學校，但「土著派」民眾反對）為契機，委員長因「擁立『會社派』而更激化對立」，因此變成常選出「土著派」。⁵⁴

上海居留民團主要的事業有：1.以共同租界防備為任務之日本義勇隊的指揮和維持；2.上海居民團立學校的經營和維持；3.墓地火葬場的經營；4.衛生防疫活動。尤其是居留民團以團立學

⁵¹ 林源三郎，〈上海居留民團〉，頁94。

⁵²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72-178。另關於上海居留民團之沿革，參閱上述〈上海居留民團〉及曹霖華、馬長林，〈上海居留民團概述〉，收入《檔案與歷史》，1990：3（上海，1990.6）。

⁵³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102。

⁵⁴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101。

校的經營和維持為重點，因此使用民團預算的8成以上。例如，日本外交文書《上海居留民團業務概況》一書指出如下：

民團之事業：昭和 11 年度行政部預算約 80 萬墨西哥銀圓，其中，約 85% 用於子弟的教育。⁵⁵

表四 上海居留民團立學校設立狀況

學校名	創立年	備註
上海尋常高等小學校	1908	因 1940 年 3 月公布「國民學校令」而改稱上海第一日本國民學校
日本高等女學校	1920	
日本尋常小學校東部分校	1923	1926 年改稱東部日本尋常小學校、1940 年改稱上海第二日本國民學校。
上海日本實業學校	1926	
西部日本尋常小學校	1927	1940 年改稱上海第三日本國民學校
中部日本尋常小學校	1929	1940 年改稱上海第四日本國民學校
上海日本商業學校	1931	
日本中學校	1939	
第二北部日本尋常小學校	1939	1940 年改稱上海第五日本國民學校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	1940	
第二中部日本尋常小學校	1940	1940 年改稱上海第六日本國民學校
上海第七日本國民學校	1941	
上海第四日本國民學校南市分教場	1942	
上海第八日本國民學校	1942	
上海第九日本國民學校	1942	
上海第二日本國民學校	1942	
上海第十日本國民學校	1943	
上海日本工業學校	1944	

資料來源：甘濃益三郎編，《上海居留民團立學校一覽》（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36）；松下綠、甫喜山精治編，〈戦前の上海日本各學校の沿革と関連資料〉，收入《アジア遊學》，33（東京：勉誠出版，2001.12）。

⁵⁵ 參見《上海居留民團業務概況》，收入《在外帝國居留民團及民會關係雜纂》（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關於上海義勇隊，高橋孝助·古厩忠夫編《上海史》（東京：東方書店，1995），頁112；關於日本義勇隊，前引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178-179。

1908-1944年間，上海居留民團開辦如表四之學校。⁵⁶關於民團立學校的學生總數，1908年為225人（占上海日本僑民總數的3%）、1914年為585人（占5.3%）、1919年為1,002人（占5.7%）、1923年為1,660人（占9.9%）、1931年為3,345人（占13.8%），尤其是1920年代激增至2,000人以上。⁵⁷此一情況可說顯示來到上海的日本人之性質由單身出外型逐漸轉變為攜帶家眷定居型。再者，第二次上海事變以降，隨著上海日本僑民激增，民團立學校亦增設。1943年4月上海日本僑民數為102,716人、國民學校學生總數為10,923人。⁵⁸

要之，上海居留民團不過是在「會社派」影響下的自治團體之一罷了，就其事業觀之，可知部分彌補歐美人壟斷的行政權，「從居留民取得稅金，經營小學校和火葬場」。⁵⁹居留民團於第二次上海事變後以支持日軍的現地行政機關而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之前其並未直接參與租界行政，也不是日本僑民——尤其是「土著派」民眾——的社會生活之後盾。

（三）町內會與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

上海日本僑民的基層組織「町內會」及其統合組織「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設立之經緯如下。⁶⁰

1915年1月底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隨著中日交涉的進展，上海排日風潮逐漸濃厚，3月中旬以降抵制日貨運動強有力地展開。至該年7月底為止，因持續的排日運動，上海日本商人之

⁵⁶ 關於上海日本僑民的教育及學校，參閱陳祖恩〈上海日本人居留民の子弟教育〉、小島勝〈上海の日本人学校の性格〉，收入小島勝、馬洪林編，《上海の日本人社会》（京都：龍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陳祖恩，〈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上海日本人学校〉，收入高綱博文編，《戰時上海：1937-45年》（東京：研文出版，2005）。

⁵⁷ 甘濃益三郎編，《上海居留民團立学校一覽》（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36）。

⁵⁸ 松下綠、甫喜山精治編，〈戰前の上海日本人各学校の沿革と関連資料〉，收入《アジア遊学》，33（東京：勉誠出版，2001.12），頁140。

⁵⁹ 米澤秀夫，《上海史話》，頁195。

⁶⁰ 關於上海日本僑民的「町內會」、「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參閱《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の沿革と事跡》（上海：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1942年）及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第7編〈上海居留民團現況〉。

交易斷絕，以致許多日本僑民生活陷入困難，有四分之一不得不暫時返回日本。因這次的排日運動而累積不滿的上海日本僑民，於 7 月 19 日與中國人巡捕發生衝突，導致兩名日本人死亡而引發大規模暴動。其中，日本僑民組織丁興里會、文路同志會、協和會、親和會、吳漢親鄰會、近親會等六個町內會。這些町內會組織自警團，與日本總領事館、居留民團合作，負責日本人之避難救護、上學兒童之護衛、交通通信之運用等任務。⁶¹

1917 年，除了上述 6 個町內會之外，再組織 6 個町內會，這些町內會爲了更加密切地互相聯絡，以謀求日本僑民對內對外福利之增進，統合 12 町內會，組成「上海日本人町內會聯合會」的統一管理機關，策劃自治工作的統一。⁶²

1925 年爆發五卅事件，町內聯合會動員町內會，組織自警團，負責警備活動。當時，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發佈，日本人居住地區必須組織町內會而加入町內聯合會，以期僑民團結一致地活動之諭告，結果，町內會陸續成立，乃由過去的 20 個町內會增爲 40 個町內會。在此，町內會聯合會爲了完成其指導功能，乃改稱爲「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使所有町內會及其會員加入各路聯合會，統制本部設常務委員會，以期處理重要的會務而遂行其事業。⁶³

《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一書中，敘述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的性質及其活動如下：

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係社會服務的團體，因此，其立場爲自由，不受任何牽制，爲了日本僑民的利害關係而活動，爲了增進福利而採積極的行動。常作爲民衆的代表機關而善導、指導及支援輿論，始終致力於日本人社會的發展。各路聯合會成立以來三十年間，常爲了日本人社會福利的進展或我帝國權益的擴張而活躍……。我們各路聯合

⁶¹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 1072。

⁶²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 1072。

⁶³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 1074。

會的活動作為上海日本僑民社會的核心體系，過去三十餘年不斷地努力，對多次的排日運動、抵制日貨運動之因應和處理，或遇到幾次的事變時發揮不屈不撓之精神而妥善處理，又，對共同租界行政之改善，勇敢地貫徹其信念。對內則致力於日本人的團結及密切的和睦、福利的增進、輿論和思想的善導、教育事業的協助、敬神思想的普及等許多社會事業。⁶⁴

此外，在各路聯合會的業績中茲列舉「值得紀錄的主要項目」如下：

- 其一、對日本兒童教育的輿論之指導
- 其二、中國實業界訪日觀光團之組織
- 其三、上海在鄉軍人之組織
- 其四、對第一次上海事變出動「皇軍」原隊之感謝行
- 其五、第一次上海事變直接受害救濟金請願運動
- 其六、建上海神社以普及敬神之念
- 其七、共同租界警察部日本隊之編成
- 其八、要求工部局各部門採用日本人職員
- 其九、要求增加共同租界市日本人參事會員之席次
- 其十、向工部局爭取日本人小學校的教育補助金
- 其十一、上海日本商業學校建設用地之交涉
- 其十二、各路聯合會對中國方面收回租界運動的因應活動
- 其十三、各路聯合會對共同租界市參事會員增強運動之因應活動

以上各路聯合會的業績可略窺其社會性質。

關於其一，各路聯合會成為上海日僑的「民眾代表機關」，是指與居留民團當局對立的事件。1921-1922年民團行政委員會設立東部小學校之際，「忽視僑民的期望」而將校舍用地設定在華德路和大連灣路的交叉口，簽訂購地臨時契約，當僑民以「該地不

⁶⁴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075-1080。

適合兒童教育」的反對論高張時，各路聯合會乃召開臨時居留民大會，敦促民團當局反省，廢除臨時契約。該事件反映出日本僑民內的「土著派」與「會社派」之對立，亦即是抗議「會社派」所掌握的民團行政委員會忽視「土著派」的民意。

關於其三及其四，顯示各路聯合會與日軍尤其是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之關係密切。1927、1929、1932年各路聯合會因與陸戰隊合作有功，而獲得感謝狀。

關於其六，可略窺各路聯合會具有天皇制意識形態。上海神社係1933年各路聯合會將滬上神社（1912年以長崎諏訪神社的分身所建）遷走，而改奉祀天照大神、神武天皇、明治天皇等。並在其傍殿建招魂社，以祭祀上海事變戰死的日本軍人。

關於其七、八、九、十一、十三，乃是以不滿日本僑民的工部局之租界行政為背景而發起。日本僑民在共同租界不僅人數居壓倒性多數，且意識到工部局的態度係「抱著英國人萬能的專橫態度對待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乃試圖向工部局擴大日本人的勢力和伸張權利。

關於十二，顯示各路聯合會為了維護日本人的權益，而否定並敵視中國的民族主義。亦即是1927年北伐軍接近上海時，要求收回外國租界的中國民眾之國權收回運動突然發生，英國乃向日本提出越界地區無條件歸還中國以作為緩和對策。在北部越界地區僑民居多數的日本拒絕了英國的妥協案，各路聯合會亦「力陳維護權益」以堅決支持日本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聯合會提出對策，組織北部越界地區的30個町內會，設立「各路聯合會北部支部」，展開情報會議、實情調查、對抗運動及請願運動。⁶⁵

1931年10月各路聯合會的組織狀況如下：

中部（虹口、閘北）町內會數18個、人員7,843人

第1區 親交會、新交會、協和會

第2區 文路同志會、協和會、一致會、赫司克而路會

第3區 吳漢親鄰會、義豐會、近親會、靶子路會

⁶⁵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1080-1087。

- 第 4 區 東興會、睦美會、一心會
 第 5 區 德親會、旭友會、東寶會、海能路會
 北部（北四川路、閘北租界外）町會數 32 個、人員 6,325 人
 第 6 區 北四川路會、北友會、丁興里會、祥豐會
 第 7 區 西士慶路會、榮華里會、吟桂路會、赫林里會、麥
 拿里會、東橫濱路會
 第 8 區 北親會、餘慶坊會、阿瑞里會、美友會、昭和會、
 寶樂安路自治會、寶樂安路會、一角會、新北會、
 朝黃會
 第 9 區 北狄思威路會、南狄思威路會、寶安會
 第 10 區 施高塔路會、興業坊會、東照會、花園里會、恆豐
 會、千愛里會
 第 11 區 有鄰會、大東街會、花園街會
 東部（楊樹浦）町會數 4 個、人員 1,010 人
 第 12 區 東友會、崑明路會、高廊橋會、滬東會
 南部（舊英租界、法租界）町會數 2 個、人員 775 人
 第 13 區 （舊英租界）實業有志會
 第 14 區 （法租界）霞飛路會
 區外（未設立町內會地區）浦東、西部
 合計：町內會數 56 個、總人數 15,953 人（其中，會員：戶長
 3,228 人、家屬 12,725 人）⁶⁶

日本人各路聯合會的町內會 70% 以上、人員 89% 為中部（虹口及閘北）和北部（北四川路及租界外）所構成，可說主要是反映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土著派」日人一般民眾之利害。

其後，1941 年 5 月，日本人各路聯合會接受上海總領事館的指導，因「鑑於時局之趨勢，關於與民團的一體化整合，表示深切的理解和大國民的胸襟，放棄一切過去的做法，完全與民團配合之整合，以全力實踐非常時期日本國民之臣道」，而於 6 月 1 日解散。⁶⁷各路聯合會和居留民團一樣，係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中有力

⁶⁶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事變誌》（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33），頁 365-367。

⁶⁷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誌》，頁 1088。

的自治組織，代表「土著派」和「會社派」的兩方有著不斷摩擦和對立的「過去」。如前所述，各路聯合會正是上海日本民眾的「中心體系」、「代表機關」，且是在租界行政的「差別待遇下，惡質頑強的排日運動每年不斷發生並增強，日本僑民在孤獨無援中致力於相扶持」的互助機關，⁶⁸該會可說以「國際都市」上海日本僑民的疏離感、孤立感及被害者意識為基礎。如此以不安的自我意識為基礎而成立的各路聯合會，在精神上，特別支持天皇制意識形態，實際上，則依賴當地日軍且積極地配合，並且爲了「維護權益」而採反對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之排外性行動。

要之，「町內會」、「日本人各路聯合會」可視爲係上海的「土著派」日本僑民所依據的「草根性法西斯主義」組織之一。⁶⁹此外，由於上海居留民團在「會社派」的影響下，而未提供日本僑民的社會生活充分的基礎，所以像這樣的社會組織才成爲日本民眾社會生活的主要依據，而實質地扮演了「自治組織」的角色。

（四）在鄉軍人會與自警團

1927年，爲了因應北伐軍進攻上海及其帶來的混亂，各路聯合會與居留民團書記長兼櫻友會（上海的在鄉軍有志會）會長友野盛協議，計畫由上海日本僑民中有軍隊經驗者組成在鄉軍人會上海支部。各路聯合會召開臨時總會，議決「在鄉軍人會組織速成案」（譯按：原文爲「在鄉軍人會組織速成の件」），在各町內會長協助下進行上海在鄉軍人調查。該年12月日本人俱樂部舉行上海在鄉軍人會成立大會，推舉陸戰指揮官植松鍊磨海軍大佐擔任該會支部長，並推舉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貞次、各路聯合會代表林雄吉擔任名譽委員。其目的爲「有事」之際支援以陸戰隊爲首的陸軍各部之行動，以及負責僑民的避難救護。⁷⁰其與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國內的在鄉軍人會相同地展開「國民思想普及運動」，對助長日本僑民的排外＝侵

⁶⁸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1073。

⁶⁹ 參閱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87），第2章。

⁷⁰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1081。

略思想，扮演主導性的角色。⁷¹

第一次上海事變爆發時其組織狀況如下。陸戰隊指揮官鮫島具重大佐擔任支部長，其下設支部副長 2 名、理事 5 名、監事 2 名、評議員 20 名，執行支部所有的事務。其次，設東部、西部、中部、北部等分會，各分會設分會長、副分會長、理事、監事，負責其管轄和聯絡。⁷²各分會的會員數如下：

北部分會 161 名、中部分會 237 名、東部分會 235 名、西部分會 89 名⁷³

此外，如前所述，第一次上海事變時，和「在鄉軍人會」一起對中國民眾做出殘虐行爲的是日本僑民組成的町內會之「自警團」。該「自警團係以 1915 年排日運動期間組成的團體爲嚆矢。當排日運動高張時，以「自己防衛、與軍方合作之目的」而組織自警團，1925 年五卅事件之際，亦「爲了團結日本僑民，以鞏固對抗戰線，維護日本人的利益及防衛生命財產」，在町內會中成立自警團。⁷⁴自警團組織「全然是以僑民社會自發性組成的各町內會爲母體」，亦即是以各町內會員爲中心，「隨機地組織」，欠缺有控制的秩序及共同活動的訓練。⁷⁵

迨至 1940 年，自警團改組爲「針對投入重慶政府恐怖攻擊或中國軍事政治計畫的不逞份子，以取締治安及防止恐怖行動爲目的」而組成的恆常性自治機關「上海自警團」。各路聯合會會長林雄吉出任該「上海自警團」團長。⁷⁶

要之，上海日本僑民的社會組織「町內會」、「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以及以上述團體爲母體而組成的「在鄉軍人會上海支部」及「自警團」，均是對抗 1915 年排日運動及以五卅運動爲代表的 1920 年代高張的中國民族運動，爲了保護日本僑民和他們擁有

⁷¹ 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上海事變に於ける帝国在郷軍人会上海支部の活動〉，收入《上海事變戰記》（上海：帝国在郷軍人会上海支部，1932），頁 143-144。

⁷²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事變誌》，頁 336。

⁷³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事變誌》，「付録事變關係者氏名表」製作而成，頁 33-45。

⁷⁴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 1089。

⁷⁵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 1090。

⁷⁶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 1089-1090。

的「權益」而組成。就成立的過程觀之，這些組織的性質本來就具有極為強烈的排外性。

上海日本僑民基本上均隸屬於「上海居留民團」、「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及「町會」，以這些團體為基礎產生「在鄉軍人會上海支部」及「自警團」。這些社會組織平常整合日本僑民，當像上海事變等緊急狀況發生時，則扮演民眾動員體制之功能。

四、在上海的日本經濟「權益」

對日本人而言，上海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日本認為「一定要固守上海」而發動戰爭？⁷⁷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觀察日本和上海的經濟關係是極為重要的。⁷⁸

如所周知，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可說是中國經濟的「心臟」。不但在整體意義上是中國經濟的中樞，也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經濟擴張的據點。對日本而言亦不例外。1930 年的中日貿易額占日本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日本對上海的貿易額顯示，除了東北地區外，對中投資半數以上是透過上海的。⁷⁹

1930 年日本對中直接投資額為 17 億 4,820 萬圓，其四分之一的 4 億 3,010 萬圓投資於上海。除了東北地區外，日本對上海投資占對中國投資的 66%。⁸⁰1930 年，東北地區的日僑占在華日人的 80%，直接投資占 62.9%，但居住在上海的日僑只占 7%，直接投資則占 24.6%。東北的日僑每個人投資 5,100 圓，但上海的日僑每個人則投資 2 萬 3,000 圓。⁸¹

上海的日本企業投資開始於中日甲午戰後不久，其大部分是

⁷⁷ 關於上海事變，「對日本人而言，上海究竟是什麼？」之疑義，最早是 Edgar Snow 所提出，詳閱 Edgar Snow（著）、梶谷善久（譯），《極東戰線》，頁 126-127。

⁷⁸ 關於日本與上海的經濟關係，參閱劉學照，〈上海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中的地位〉，收入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及山村睦夫，〈滿州事變期における上海在留日本資本と排日運動（上）〉，《和光經濟》，20：2（東京，1988.3）。

⁷⁹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共編，《上海對外貿易（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出版社，1989），頁 500。

⁸⁰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p. 469-471.

⁸¹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 473.

各種直接的事業投資，茲列舉其代表性的如下。

上海的日本銀行及類似機關如下：

橫濱正金銀行支店、朝鮮銀行支店、臺灣銀行支店、三井銀行支店、三菱銀行支店、住友銀行支店、上海銀行支店、漢口銀行支店、泰和銀行支店、上海信託會社⁸²

上海日本最大的投資事業為紡織業（即是「在華紡」），其經濟地位有所謂「與滿洲的滿鐵地位相似」。以下9家公司有32個工廠、130台紡紗機、1萬8千台織布機，雇用中國勞工20餘萬人。其投資資本多達1億5,000萬圓，為上海最大的日本企業，其主要公司如下：

上海製造絹系（公大）、同興紡織（同興）、上海紡織（上海）、東華紡織（東華）、豐田紡織（豐田）、裕豐紡織（裕豐）、日華紡織（日華）、大日本紡織、內外棉（內外）⁸³

上海日本人經營的各種工業有如下各產業：

化學工業、飲食品工業、鐵工金屬加工業、纖維染色工業、窯業玻璃工業、皮革工業、印刷工業、木材業等⁸⁴

不過，其生產規模、生產能力等之比例均極為微小，亦包含許多家庭工廠，企業的零星性為其特徵，投資總額估計約3,000萬圓。

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幾乎是所有日本巨大貿易業者均擁有店鋪，作為對中國貿易之根據地：

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大倉商事、住友本社、古河電器工業、日本棉花、東洋棉花、江商、伊藤忠

此外，在上海設總部的日本貿易業者亦為數甚多，雖大多不

⁸²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東京：生活社，1939），頁479。

⁸³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頁480-481。

⁸⁴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頁481-482。

過是從事單一商品或類似數種商品之交易，然而，其中亦有歷史悠久、擁有資力、從事大宗貨物交易者。關於一般商業部門，所有的中小企業均以虹口為中心而經營。上海日本僑民的貿易及商業投資總額大約2億圓。⁸⁵

上海不僅是東亞地區最大的停泊港，也從事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內河航行、往南北中國的沿海航路。日本以上海為中心對中國的航路如下：

日清汽船（上海—長江之內河航行、上海—華北、華中的沿海航路）、大連輪船（上海—華北—大連、華南沿岸航路）、大阪商船（上海—華南—臺灣航路）、日本郵船（上海—長崎航路）

隨著這些海運業進入，在黃埔江經營駁船業及各種倉庫，航運和倉庫的投資額估計約3,000萬圓。⁸⁶

在上海，日本事業投資最大的是紡織業，其次是貿易業。當時日本的資本、技術、人才等條件，具有在上海發展之可能。英國在上海平均地投資銀行、製造業、貿易、海運、不動產、公益事業等各種企業，獲得相當的利潤而成為上海經濟界的重鎮，相較而言，不可否認的，日本在上海的事業投資欠缺平衡，而具經濟的脆弱性。⁸⁷此外，上海存在以巨大資本的日本紡織業及三井物產為代表的國際性貿易業者，以及各種零星的日本人經營企業，上海日本資本是以「多層的結構」為特徵。⁸⁸

1914年以降，上海作為工商業中心地而飛躍地發展，給予日本資本及日人經營者更多的機會，上海作為日本的投資市場，一貫地增長其重要性。實際上，日本對上海的投資從1914年的6,000

⁸⁵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頁483-484。

⁸⁶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頁484-485。

⁸⁷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頁488；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p. 395-396.

⁸⁸ 關於上海日本資本之結構和動向，山村睦夫，〈滿州事変期における上海在留日本資本と排日運動（上）〉，頁125。

萬圓至1930年的4億3,000圓，顯示飛躍地成長多達約7倍。⁸⁹不可忽視的是，其大多靠日本紡織資本進入上海，又以1930年前後上海事變爆發前之銀價暴跌、中國關稅之提高、日本國內經濟恐慌而產生過剩資本為背景，「日本中小資本大舉進入上海」之現象。⁹⁰此一時期上海新設的日本企業，就行業別觀之，製造業最為顯著，橡膠工業、保溫瓶製造工業、製傘、製帽、製紙等雜貨工業，調味料等化學工業，以及釀造業、罐頭食品製造等以輕工業為中心的工廠紛紛進入。這些行業和日本紡織業一起，特別與中國國民政府產業保護政策下發展的上海民族產業形成對立競爭之關係。⁹¹

第一次上海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此次上海我海軍的行動……目的在於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和維護我方權益」之聲明。⁹²並以外務省情報公布當地應保護的僑民狀況和應維護的「權益」（主要事業及投資額）如下：

上海東部（虹口河以東至吳崧）：日本僑民5,000人

1. 投資額1億4,500萬兩

2. 主要事業：大康紡織1,800萬兩、上海紡織3,600萬兩、公大紡織1,800萬兩、同興紡織900萬兩、郵船滬山碼頭800萬兩、裕豐紡織1,600萬兩、東華紡織1,000萬兩、明華製糖500萬兩、大連汽船碼頭500萬兩、精版印刷200萬兩、大阪汽船碼頭500萬兩、康泰莫大小200萬兩、上海倉庫100萬兩、東方製冰50萬兩、日華紡織吳崧200萬兩、三井木廠100萬兩、瑞豐50萬兩、其他60萬兩

上海中央（舊英租界）：日本僑民500人

1. 投資額4,100萬兩

⁸⁹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 473.

⁹⁰ 外務省總務課，〈現段階ニ於ケル排日貨運動ノ特殊性〉，《滿州事變—排日排貨關係—中支ノ部》（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

⁹¹ 參閱堀本尚彦，〈上海の抗日運動と日本人居留民〉，《信大史學》，14（長野，1989.11），頁31-33。

⁹² 〈上海事件に対する帝國政府の聲明書〉，《東京日日新聞》1932年1月30日，1版。

2. 主要事業：日清汽船 1,800 萬兩、橫濱正金銀行 600 萬兩、三菱公司及銀行 300 萬兩、臺灣銀行 220 萬兩、三井洋行及銀行 500 萬兩、郵船 220 萬兩、日本棉花 100 萬兩、住友銀行及洋行 160 萬兩、朝鮮銀行 100 萬兩、其他 100 萬兩

虹口閘北：日本僑民 18,000 人

1. 投資額 3,006 萬兩
2. 主要事業：郵船碼頭 1,500 萬兩、總領事館 200 萬兩、虹口土地組合 700 萬兩、東亞興業 400 萬兩、上海印刷 100 萬兩、日本人俱樂部 100 萬兩、寶山玻璃廠 100 萬兩、其他 500 萬兩
西部（蘇州河上游法租界西部「越界地區」及租界外等）：日本僑民 400 人

1. 投資額：1 億 3,700 萬兩
2. 主要事業：內外棉花 5,300 萬兩、日華紡織 3,000 萬兩、豐田紡織（租界外）2,000 萬兩、同興紡織 900 萬兩、上海絹絲紡織 500 萬兩、東亞製麻 380 萬兩、東亞同文書院 300 萬兩、東方文化 450 萬兩、中華皮革 150 萬兩、其他 700 萬兩
浦東（租界外）：日本僑民 500 人

1. 投資額：2,100 萬兩
2. 主要事業：日華紡織 600 萬兩、三井碼頭 450 萬兩、菱華倉庫 300 萬兩、日清碼頭 200 萬兩、大倉碼頭 100 萬兩、郵船碼頭 200 萬兩、大阪商船碼頭 100 萬兩、其他 150 萬兩⁹³

值得注意的，似乎是成爲上海事變主要的舞台、日軍及日本僑民虐殺中國民眾的現場虹口和閘北地區之狀況。該地區雖是日本僑民最集中之地，但反而是每一日僑投資額最低之地，該地區並未有構成上海日本主要權益的「在華紡」及財閥系有力資本。如上所述，該地區乃是「土著派」的日人民眾密集居住之地，他們是從事經營基礎極爲脆弱且不安定的中小商工業及雜業者。

然而，當時日本一般輿論究竟如何看待與日本的「權益」相關的上海事變？似乎從小說家村松梢風的言論中可略窺：

⁹³ 〈邦人上海投資額は〉，《長崎日日新聞》（長崎），1932年2月17日，5版。

日本人若放棄花費五十年才完成的「上海日本」，將是什麼也沒有了。長江貿易年額至少五、六億，多的時候達七億以上。滿洲像是日本的生命線一般，長江貿易則是日本的營養線。若放棄這條營養線，那麼將是什麼也沒有了。無論如何戰鬥，沒有理由放棄其巨大的權益。我們必須設法幫助三萬的上海僑民，不可對他們見死不救。這是國家和政府當然的義務。⁹⁴

由上顯示，肯定滿洲事變的言論仍舊用到上海，堅決地本乎國家利己主義，主張以武力維護日本的經濟權益和保護日本僑民，而全然無視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此的日本輿論正是從根本上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滿洲事變、上海事變的侵略戰爭。

五、結論

本文探討上海的「土著派」日本僑民的存在及他們所組織的「町內會」及其統合組織「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的社會性質，以究明上海日僑社會較其他外僑社具封閉、排外的特性之要因。要之，上海日本僑民社會之性質最重要的在於「土著派」日本僑民階層。「土著派」日本僑民居住在俗稱「日本租界」的虹口地區及毗鄰的閘北等上海市區邊緣地帶。他們在「國際都市」上海邊緣性地存在，其人數在上海外國僑民中居壓倒性多數，但被租界行政當局所忽視，且與稱爲「會社派」的日僑精英階層相對立，而平常就鬱積不滿。蓋因他們係由經濟基礎脆弱的中小商工業者及基層民眾的雜業、失業者所組成，且與同樣職業的中國民眾混居，而在生活和經濟上直接接觸和競合，對中國人抱持蔑視觀而將中國民眾當作其不滿的宣洩口。他們遭遇一再發生的排日運動，激發其孤立感、不安感、被害意識，而強化與當地日軍和天皇制意識形態相依賴的態度；另一方面，爲了對抗排日運動而

⁹⁴ 村松梢風，〈上海事變を觀てくる〉，《中央公論》，1932：4（東京，1932.4），頁343。

組成「町內會」及其統合組織「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等自治組織。

第一次上海事變之際（1932年），上海「土著派」的日本僑民爲了阻絕排日運動，一再要求發動武力而促成日本海軍陸戰隊採取行動之機；事變爆發後，積極地與日本軍部合作，虐殺許多中國民眾。不過，另一方面，「會社派」的日僑精英階層爲了恢復本身已擁有的龐大「權益」，乃高唱現地保護主義而阻止撤出日僑，並給予日本軍部爲了「維護僑民生命財產及我方權益」而出兵的口實，並提供日僑民眾階層爆發排外情緒而發動暴虐行爲的理由。要之，「會社派」精英階層及其追隨的中間階層，雖然與他們在上海的生活情況不同的「土著派」一般民眾有許多對立，但處於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對決時，則高揚「帝國意識」而採一致的行動。

此外，上海日本僑民在第一次上海事變時的暴虐行爲與關東大地震時虐殺朝鮮人、中國人極爲相似。筆者認爲，此與日本僑民，尤其是作爲其「集結體」的町內會及其所屬的自警團、在鄉軍人會的體質有關。再者，值得注意的，這些暴虐行爲即使引起國際強烈的責難，在日本國內卻被認爲完全沒有問題。甚至今日，在日本出版稱爲「魔都上海」等而助長對老上海的日本人獨善的浪漫主義之「上海相關書籍」爲數甚多，然而，關於第一次上海事變時日本僑民的殘虐行爲，卻幾乎未予以關心。

附錄：上海日本僑民相關地圖



A · 郵船社宅	H · 福民醫院	O.上海每日新聞	V.海軍下士集合所	c.郵政局
B · 陸戰隊本部	I. Blue Bird (舞廳)	P.中部日本尋常小學校	W.披爾斯公寓	d.老百匯大廈
C · 上海神社	J.上海歌舞伎座	Q.同仁醫院	X.租界憲兵隊本部	e.三角地市場
D · 女子商業學校	K. 北部日本尋常學校	R. 西本願寺上海別院	Y.東本願寺上海別院	f.日本總領事館
E · 高等女學校	L.大和旅館	S.東和洋行	Z.日本俱樂部	
F · 第5國民學校	M.Japan Tourist Bureau (日本旅行協會)	T.融光戲院	a.內山書店	
G · 上海特務機關	N.租界部隊本部	U.東和劇場	b.魯迅宅	

參考資料：NHK「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取材班編，《上海共同租界》（東京：角川書店，1986）。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外務省總務課，《滿州事變—排日排貨關係—中支ノ部》（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

《在外帝國居留民團及民會關係雜纂》（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事變誌》，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33。

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会の沿革と事跡》，上海：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1942。

上海居留民團編，《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記念誌》，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42。

上海市虹口區志編纂委員會編，《虹口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甘濃益三郎編，《上海居留民團立学校一覽》，上海：上海居留民團，1936。

米澤秀夫、浜田峰太郎編，《大上海要覽・案内》，上海：上海出版社，1935。

島津四十起編，《上海案内（第 10 版）》，上海：金風社，1924。

二、報紙

《上海新報》（上海）

《上海日報》（上海）

《東京日日新聞》（東京）

《長崎日日新聞》（長崎）

三、近人專書

中内二郎，《居留民團の研究》，上海：三通書局，1941。

小澤正元，《内山完造伝》，東京：番町書房，1972。

上村松伸，《上海・都市と建築》，東京：PARCO 出版，1991。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共編，《上海對外貿易（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内山清等編，《大上海》，上海：大上海社，1915。

池田桃川，《上海百話》，上海：日本堂書店，1921。

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

杉江房造編，《新上海》，上海：日本堂書店，1918。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上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

- 高橋邦夫，《帝国海軍と上海事変》，東京：日本評論社，1932。
- 高橋孝助、古厩忠夫編，《上海史》，東京：東方書店，1995。
- 唐權，《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東京：新曜社，2005。
- 森崎和江，《からゆきさん》，東京：朝日新聞社，1976。
-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樋口弘，《日本の対支投資研究》，東京：生活社，1939。
- 榛原茂樹、柏正彦，《上海事件外交史》，東京：金港堂書籍，1932。
- 藤村道生，《日清戦争》，東京：岩波書店，1973。
- NHK「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取材班編，《上海共同租界》，東京：角川書店，1986。
- Beasley, W. G. 著、杉山伸也譯，《日本帝國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0。
- Remer, C. 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 Snow, Edgar 著、梶谷善久譯，《極東戦線》，東京：筑摩書房，1987。
- Hauser, Ernest O.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Harcourt, 1940.

四、近人論文

- 木村健二，〈在外居留民の社会活動〉，收入《近代日本と植民地》，5，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27-56。
- 山村睦夫，〈満州事変期における上海在留日本資本と排日運動（上）〉，《和光經濟》，20：2（東京，1988.2），頁115-136。
- 山村睦夫，〈上海日本人実業協会役員層の分析〉，《和光經濟》，26：3（東京，1994.4），頁113-129。
- 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上海事変に於ける帝国在郷軍人会上海支部の活動〉，收入《上海事変戦記》，上海：帝國在郷軍人会上海支部，1932，頁143-156。
- 杜紹文，〈虹口「東洋街」之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虹口區委員會，《虹口史苑》，上海：該會，2001，頁519-521。
- 佐藤貞之，〈上海在留日本人人口調査〉，《支那研究》，20（上海，1929.7）。
- 村松梢風，〈上海事変を觀てくる〉，《中央公論》，1932：4（東京，1932.4），頁338-351。
- 周志正，〈日本人在上海〉，收入《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史志資料選輯》，12，上海：上海市虹口市志辦公室，1994。
- 松下綠、甫喜山精治編，〈戦前の上海日本人各学校の沿革と関連資料〉，

- 收入《アジア遊学》，33（東京：勉誠出版，2001.12），頁 138-149。
- 林源三郎，〈上海居留民團〉，收入《支那研究》，19（上海，1929.5）。
- 陳祖恩，〈明治時代的上海日本居留民〉，《上海文化》，1995：1（上海，1995.1）。
- 陳祖恩，〈上海日本人居留民の子弟教育〉，收入小島勝、馬洪林編，《上海の日本人社会》，京都：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1999，頁 113-133。
- 陳祖恩，〈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上海日本人学校〉，收入高綱博文編，《戦時上海：1937-45》，東京：研文出版，2005，頁 273-300
- 陳祖恩，〈西洋上海と日本人居留民社会〉，收入大里浩秋、孫安石編，《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頁 201-231。
- 副島圓照，〈戦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稿）〉，《和歌山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33（和歌山，1984），頁 1-35。
- 曹霖華、馬長林，〈上海居留民團概述〉，《檔案與歷史》，1990：3（上海，1990.6）。
- 堀本尚彦，〈上海の抗日運動と日本人居留民〉，《信大史学》，14（長野，1989.11），頁 22-52。
- 桂川光正，〈上海の日本人社会〉，《国際都市上海》，大阪：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1995，頁 29-97。
- 劉學照，〈上海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中的地位〉，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出版地不詳：該會，東京，1988。
- 譙樞鋁，〈進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会，《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出版地不詳：該會，1988。